

你在文章中提出了如何避免技术革命的盲目性的问题。我体会这首先就是要预见到技术革命的全面内容。这就是说，这第三次技术革命(或工业革命)不仅应该包括“电脑”和原子能这两个基本上属于劳动工具革命的两个方面；而且要包括原材料革命，即劳动对象革命这第三个内容。同时要预见到这些技术革命所将引起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。前者是自然科学家的任务；后者是哲学社会科学家，特别是经济学家的任务。我深深感到你们自然科学家远远走在我们前面，任务比我们完成得好，远远地好过我们。

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了近 20 年前你提起的边缘科学问题。上述这个任务必须由自然科学家和哲学、社会科学家共同来完成。不久前，我曾经向方毅和于光远两位科学界领导人提出，在两个科学院在组织机构上分离之后，如何注意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互相沟通的问题。你是一向注意于这项沟通工作的。我盼望你今后在这个沟通工作方面，作出更大贡献。

我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小学生水平，以上所说不免有不少外行无知的话，请不客气地指出：

此致

科学的敬礼：

孙冶方

1978 年 3 月 24 日

## 重读孙冶方的来信

钱 学 森

现在再次看到孙冶方在 1978 年 3 月 24 日写给我的这封信，思绪千万。还是 28 年前，许国志和我想把现代科学技术，特别是数学方法引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和企业事业的组织管理工作，所以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了一个运筹学教研组，以后又扩大成为一个研究室。孙冶方就是一位积极支持者，我对他的这种开创精神是非常敬佩的。所以我尽管对社会科学是个外行，也不放过学习冶方在报刊上的著述的机会；当然，我能学到的是极其有限的。

中间是 10 年浩劫。

在孙冶方写这封信后不久，在 1978 年 5 月初我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重提运筹学和系统工程，在 5 月下旬、6 月上旬、6 月中旬又分别在成都、昆明和长沙讲这个题目。在旅程中，我虽然没有见到孙冶方，但很多同志告诉我，冶方也同时在西南省区讲学，并说他精神饱满，讲述他对实现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意见。这些信息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。我们虽未面谈，但心是联在一起的。

冶方在这封信里表达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；材料科学的重要性已经确立（见《红旗》1984 年 7 期严东生文），而技术革命也已成为今天大家热烈讨论的问题。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互相沟通的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；也还有不少人反对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互相沟通。孙冶方已离开了我们，我们有责任认真按照他正确的意见去办事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前进发展。